

中国山水画通鉴

写貌 家山

上海书画出版社



浙江 程邃 孙逸 查士标

汪之瑞 江注 郑昉 祝昌 姚宋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写貌 家山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貌写家山 / 黄剑撰文. —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75-8

I. 貌… II. 黄… III. 山水画—艺术评论—中国—清代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29 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倪 凡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貌写家山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8.5 印数: 1-3,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275-8/J · 259

定价: 35.00 元

主 编 卢辅圣
副主 编 汤哲明
编 委 王 彬
黄 剑
彭 莱
漆 澜
邵 琦

本书撰文 黄 剑

- 1 范山模水
- 2 三家鼎峙
- 3 一片江南
- 4 林泉高致
- 5 超以象外
- 6 千里江山
- 7 水墨苍劲
- 8 山外青山
- 9 托古改制
- 10 窠石平远
- 11 界画楼阁
- 12 湿墨繁笔
- 13 胸中逸气
- 14 幽涧潺湲
- 15 刚逸纵肆
- 16 吴门风规
- 17 院体别绪
- 18 城市山林
- 19 南顿北渐
- 20 云间秀色
- 21 苍翠无尽
- 22 貌写家山
- 23 溪山卧游
- 24 六法之外
- 25 搜尽奇峰
- 26 入赘大统
- 27 钟山烟云
- 28 皇輿揽胜
- 29 维扬异趣
- 30 奇园胜境
- 31 海上墨林
- 32 绍往开来
- 33 大朴不雕
- 34 江山多娇

中国山水画通鉴

写山 貌家

文 黄剑

前言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还，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楔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行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貌写家山》为第二十二册，主要阐述清初新安地区的山水画。

目录

- 一 新安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 5
- 二 新安画派的源流与师承 21
- 三 “新安四家” 37
- 四 新安画派的“貌写家山”和“行走”特质 75
- 五 新安画派“四大弟子” 103
- 六 新安画派的艺术品格及其影响 113

■ 新安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

新安是徽州的古称，地处今安徽省南陲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之间，为低山及丘陵地貌，新安江及其支流练江、渐江、丰乐水、富资水、布射水、杨之水以及众多发源于山间的小溪流共同组成了新安江水系润泽其间。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历来比较稳定，秦始皇设歙县和黟县，三国时孙权分为六县设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称新安郡，隋代改称歙州，至唐代中叶起一直领有歙、休宁、黟、婺源、绩溪、祁门六县，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明清则为徽州府，领县不变，府治歙县。

新安的地望，向来有“吴楚分源”之说，自古就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南宋《新安志》称此地“山限垠隔”，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对此解释为徽州一府地处“山岭川谷崎岖之中”，故而成就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地域。因此，新安从来不是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那些为“逐鹿”而进行的大小战争，也跟新安没什么关系，倒是那些中原的战败者在逃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到此地。新安“介万山丛中”，自是避难隐居的好去处，魏晋以后，凡是乱世必有大量北人南迁至此。大规模的中原衣冠南



新安地貌

迁计有三次：一为西晋末的“永嘉之乱”，一为唐末黄巢起事，最后一次为北宋“靖康之乱”后的宋室南迁。“新安大好山水”（南朝梁武帝语）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些外来者，他们“聚族而居”，在这块土地上过起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清康熙《徽州府志·风俗》记载：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宵小不敢肆焉。

有如此稳定而又秩序俨然的“胜于他邑”的生活，无怪乎历代都有人将新安附会为陶渊明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不过新安虽然山清水秀，却究竟“地

狭民膏”，逐渐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避难者和他们的子孙，南宋罗愿编撰的《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篇里写道：

（新安）山限垠隔，民不染他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女子正洁不淫佚，虽饥岁不鬻妻子。山谷民衣冠至百年不变。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贫。

这里所提到的唐朝末年，新安地区人口不到五十万，“能寒暑”地辛勤劳作、“恶衣食”地节衣缩食，却仍不免“益贫”，到了明清之际，徽州人口已达一百五十万，“七山二水一分田”（徽谚）的逼仄生存环境使得耕种或“山伐”之类的传统农业劳作已不能维系最基本的温饱，而如果温饱尚不能解决，这些被“山限垠隔”的山民即便“正洁不淫佚”、“饥岁不鬻妻子”，也不过是穷人的洁身自好而已，又怎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事实也是如此，新安在南宋甚至元代以前并无多少“重量级”的文化名人，虽然也出了朱熹（1130—1200）这样的理学宗师，但他籍贯婺源，却是在父亲为官的福建出生并成长。直到南宋初年徽州形成外出经商的风气以后，随着经济生态的改变，新安地区的文化生态才日益改善，并发展成为东南文化重镇。

“靖康之乱”以后，北方迁居徽州的人数急剧增加，使得本来就人多地少的矛盾越发突出。由于南宋偏安朝廷的首都临安距离徽州较近并且水路相通，那些南迁而来的王公贵胄需要大兴土木建造供他们“西湖歌舞”的“楼外楼”，而徽州正好盛产竹木，一些精明的徽州人就砍伐山中竹木编成桴排，沿新安江漂流而下，到达临安后再拆开出售。正是靠这种艰苦

而危险的劳动，新安人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后来除了贩卖竹木、茶叶等新安特产以外，他们还做起了各式各样的买卖，这便是最早的一批徽州商人。但是无论从他们的人数还是经济实力来说，都不足以改变新安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更谈不上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了。不过，到了两百多年以后的明朝，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新安“业贾者什七八”^①，并且早已不是小打小闹的初级暴发户，他们已经发展成为能够主宰某一地区甚至全国经济命脉的大商人，他们的商业网络遍及各地：

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者皆有之，即山陬，海圩，孤村僻垠，亦不无吾邑之人。^②

因而便有了那句“无徽不成镇”的俗语。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是惊人的：

万历盛时，（徽商）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③

当时明王朝每年全国的税收总额不过一千多万两，正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④。到了清代，徽商的地位更加巩固了，势力也更大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随着徽商财富的增加，他们的家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岩镇志草·发凡》记载，原来不过几百户的歙县城“巨室云集，百诸皆兴，比屋鳞次，无尽土之隙”，“舆马辐辏，冠盖丽都”，而这些徽商们在徽州各地的老家也由

浙江學人寫于
披雲峰下



浙江披云峰图轴

茅屋草舍的小村落变成了“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⑧的大村镇。

然而对徽州商人们来说，最尴尬的是，无论他们拥有多么惊人的财富，也难以摆脱位居“四民之末”的偏见。因此他们一方面要“贾而好儒”、要“咸近士风”，期以“儒商”的形象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还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新安的文化地位，从而以“东南邹鲁”的底气获得更多的文化自信心。所以，徽商在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以及支持家乡文化事业方面所付出的财力丝毫不亚于建屋造园的耗费，于是新安便有了“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⑨的景象。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明清两朝徽州一共出了六百多名进士，按人口平均计算，超过人文荟萃的江浙两地，位居全国之冠。这样一来，商人阶层本身也获得了良性循环，随着一些未走仕途的读书人不断加入经商的行列，真正成为“士而兼商”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稳定的物质保障，“留守”家乡的新安子弟既可以专心攻读四书五经以求闻达，也可以从容研习诗文书画以愉身心，于是乎“士习蒸蒸礼上，讲学不辍，诵读诗书，比户声明文物，盖东南屈指焉”^⑩。

只有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作为“文之极也”的绘画才能在新安地区得以发展，并且在明末清初蔚然成为引领风骚且影响深远的“新安画派”。而这其间，徽州商人对新安画坛的直接襄助之力和间接提掖之功仍不得不提。

明清时期的徽商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更不乏身兼商人与艺术家双重身份的审美水平极高者，因此他们对绘画的喜好绝非暴发户式的附庸风雅。他们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四处搜寻并购藏的大量艺术品无疑也具有很高的价值，甚至包括大量艺术史上公认的杰作。明末清初的徽州古物（书

画、古玩）商人吴其贞（生卒不详）在他撰写的《书画记》中说：

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

由此看来，当时新安地区不但形成了收藏古玩字画的风气，而且还以此来区分雅俗。上面引文中提到的“汪司马”就是明代学者、军政界司马侍郎，当时被尊为文坛祭酒的汪道昆（1525—1593），他在京为官时热衷购买古字画，晚年告老还乡后，故乡的文人雅士纷纷登门求观。徽商正是以这样的一流人物为“追星”的对象，争相购进字画古玩并运回老家收藏，一时间徽州文物字画云集，令家乡孺子眼界大开。吴其贞还在《书画记》中回忆道：“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

与汪道昆同时的著名文学家，明代文坛“后七子”之一王世贞（1526—1590）在《觚不觚录》中说：

画当重宋，三十来忽重元人，乃至倪瓒，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

可见由于徽商大量收购书画，不但“炒”热了书画市场，甚至于间接引导了一时的审美趣味。现存有据可查的名画，如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宋

